

在徐汇区资深教育人士于东航看来，学校不能是“无限责任”，不能把孩子在学校发生的所有问题都让学校承担责任。**家校关系比较脆弱，甚至有点类似医患关系。**

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，提出的要求很具体：“每节课间应安排学生走出教室适量活动和放松。”

即便如此，不少学校的“课间十分钟”仍然消失了，首当其冲的原因是“校园安全”。

有的校园面积不大，但楼层多，楼道、走廊较狭窄。短短十分钟，如果有成百上千名学生在楼梯上下奔跑，确实存在安全隐患，容易产生拥挤踩踏风险。因此，对于这样的学校来说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少一事不如没有事，把孩子“禁闭”在教室里最省事。

学校的担忧并不是毫无来由。某地法院近年来审理的29起校园人身伤害类案件中，91%发生在课间或放学期间，86%发生在操场和教室。从判决结果看，学校被判承担30%以上责任的占比50%，原因是，“学校教育、管理不到位，安全隐患未排除和未能及时救助”。

如此说来，孩子一出事，学校就可能吃官司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有的学校干脆一刀切，禁止孩子课间玩耍。一到下课铃响，就严阵以待，有的学校甚至安排班主任“盯班”，不能空岗。

上海师范大学附属浦东临港小学（以下简称“临港小学”）校长杨丽莉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她所在的学校并不存在“课间十分钟消失”的情况，但学校十分注重“课间十分钟”的安全问题。临港小学是一所新建的学校，目前只有一到三年级的学生，

低年级的孩子更需要老师多留意，因此下课时班级里通常都有老师在，走廊上也有护导老师巡逻。

即便如此，也不能百分百确保小朋友在校园里“0事故”。前不久，一个女孩下课期间先去做了其他事情，临近上课才想起来要喝水，在返回教室时因为动作太快，避让正在整队准备上体育课的小朋友而一脑袋撞在了墙上，脸上需要缝针。“我们老师都提醒过小朋友下课先去上厕所或喝水，也提醒大家教室和走廊要慢慢走，墙壁转角等地方我们也有贴防撞贴，一些拐角的建筑材料也经过打磨处理，但这个女孩还是受伤了。”杨校长感叹，这件事校方查了监控，也请警方介入，可以证明校方和老师没有过错，幸好女孩家长也通情达理，最终事件妥善解决。

但是，并不是每一个学校都像临港小学那么幸运。《新民周刊》调查发现，校园安全事故有时候会存在这样情况：如果存在监控死角，家长不依不饶，即便校方没有明显过错，家长一次次去学校或者教育部门反映问题，或者发点小作文或者拍个小视频发到网上，这就让学校很被动。一些学校不得不为此做出一定赔偿，相关老师也为了处理这样的事情而身心俱疲。

在上海市正高级教师、上海市心理特级教师杨敏毅看来，“课间十分钟消失”的原因要分年龄，小学期间可能集中在安全问题，而这

又和很多家长的观念有关。她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：“我们那时候的家长觉得孩子在学校挂点彩并不是什么大事，毕竟孩子天生好动。而现在的部分家长或老人特别宝贝自家的孩子，稍微有点擦破皮就觉得是不得了的大事，把学校放在了对立面。”

因为个别“难搞家长”的存在，也让部分学校选择把孩子在课间“圈养”起来，不动就不太容易出事，这样的懒政似乎也是一种无奈之举。一个残酷的现实是，虽然社会对把课间十分钟还给孩子有普遍共识，可一旦意外落在了某个具体学生头上，家长恐怕还是得去找学校负责。

在徐汇区资深教育人士于东航看来，学校不能是“无限责任”，不能把孩子在学校发生的所有问题都让学校承担责任。他对《新民周刊》坦言：“现在的家校关系比较脆弱，甚至有点类似医患关系。”

而对于中学生而言，“课间十分钟消失”的原因往往和学业有关。

在升学压力下，有的主课老师争分夺秒“抢”时间。上节课老师怕落下进度拖堂两分钟，下节课老师怕学生进入状态太慢提前两分钟上课，还有不少老师布置了“课间作业”，在“争分夺秒”的紧迫感之下，令学生们头疼的“无缝衔接”就自然形成了。

位于黄浦区绍兴路的上海民办永昌学校，是一所九年一贯制的民办学校，对于拖堂现象下了“撒手锏”。副校长俞越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：“铃声响了，老师总想着说完这个点下课，在老师看来可能也就拖堂两三分钟，但下课一共才十分钟（还包括两分钟预备时间），下课后学生还要